



文 | 苑 | 百 | 花 | 论 | 丛

# 民族神话、传说意象

## 与中国新诗民族性的建构研究

MINZU SHENHUA CHUANSHUO YIXIANG  
YU ZHONGGUO XINSHI MINZUXING DE JIANGOU YANJIU

刘长华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获湖南师范大学文学学院出版基金、湖南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项目“民族神话、传说意象视野下的当代大陆新诗与台湾汉诗之互文研究”（15K078）的资助和支持。

# 民族神话、传说意象 与中国新诗民族性的建构研究

刘长华 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族神话、传说意象与中国新诗民族性的建构研究 / 刘长华著.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6

ISBN 978 - 7 - 5648 - 2842 - 4

I. ①民… II. ①刘… III. ①神话 - 影响 - 新诗 - 诗歌研究 - 中国  
IV. ①I207.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81621 号

## 民族神话、传说意象与中国新诗民族性的建构研究

刘长华 著

◇组稿编辑：李 阳

◇责任编辑：何雅静 张 严

◇责任校对：赵婧男

◇出版发行：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长沙市岳麓山 邮编/410081

电话/0731 - 88873071 88873070 传真/0731 - 88872636

网址/<http://press.hunnu.edu.cn>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长沙印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10mm × 1000mm 1/16

◇印张：18. 25

◇字数：320 千字

◇版次：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 - 7 - 5648 - 2842 - 4

◇定价：55. 00 元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本社购书热线：0731 - 88872256 88873071

投稿热线：0731 - 88872256 13975805626 QQ：1349748847

# 目 录

绪论 “我心永恒”：中国新诗民族性宜向何处探询 .....	(1)
第一节 研究的历史回顾与目的 .....	(1)
第二节 研究的理论基础与意义 .....	(8)
第三节 研究的主要思路与方法 .....	(15)
第一章 民族神话、传说意象联姻中国新诗的历史境遇 .....	(19)
第一节 “五四”前后中国神话学理论的自觉 .....	(20)
第二节 “启蒙”文化想象和“混沌”生存格局 .....	(29)
第三节 文艺现代性的出场使命和内蕴意向 .....	(39)
第四节 庄骚精神的历史“复活”和现代诠释 .....	(48)
第二章 民族神话、传说意象联姻中国新诗的时代特征 .....	(57)
第一节 用典思想归化为先锋精神 .....	(57)
第二节 文化意识对历史意识的覆盖 .....	(65)
第三节 崇高之质和优雅之文兼容 .....	(73)
第三章 民族神话、传说意象与中国新诗的价值取向 .....	(83)
第一节 英雄“德性化”与个人意志在同构中集体化 .....	(83)
第二节 “化生”神话与主体生命在现世中的“生生” .....	(91)
第三节 “人之神化”与人性显现于诗性、神性的分流 .....	(99)
第四节 “神之无所不能”与“有我”意识或参与精神 .....	(107)
第四章 民族神话、传说意象与西方诗学的中国化 .....	(114)
第一节 “神思”非本体性与新诗浪漫主义的“游”之根底 .....	(114)
第二节 “生命共感”意识与新诗象征主义的“契合”论 .....	(124)
第三节 压抑型的人格意志与新诗生命诗学的“人文性” .....	(132)
第四节 祖先崇拜与新诗神秘主义诗学的“去宗教性” .....	(141)

第五章 民族神话、传说意象与传统诗歌类型的承继 .....	(149)
第一节 生命的游移与“游仙”题材的时代守护 .....	(149)
第二节 “神仙道化剧”与中国现代“剧诗”的源归 .....	(158)
第三节 “敬天崇道”精神与新诗的“青词化”印痕 .....	(167)
第六章 民族神话、传说意象与主要作家的个性实践 .....	(176)
第一节 郭沫若：膜拜东方创始女神与体验诗的“创造”本质 .....	(176)
第二节 闻一多：信仰、幻美、强力融合中复活“楚辞” .....	(184)
第三节 朱湘：民族神话、传说启示新诗的“载神道”观 .....	(193)
第四节 冯至：民族神话、传说潜含新诗的“思” .....	(201)
第五节 唐湜：“风土故事”是狂欢诗学与“牧歌”的本土范型 .....	(210)
第六节 “寻根派”：民族远古神话是“神性”生命的歌唱 .....	(219)
第七章 民族神话、传说意象与新诗艺术的本土着色 .....	(229)
第一节 图腾心理与新诗对意象的重视 .....	(229)
第二节 混沌思维、现世之感与新诗的“纯”和“不纯” .....	(238)
第三节 “乐感”气蕴与新诗的抒情主义传统 .....	(246)
第八章 少数民族作家对民族神话、传说意象与诗歌联姻的回应与启示 .....	(254)
第一节 地域性是参与民族性诗学建构的渠道 .....	(254)
第二节 宗教意识是民族性诗学尝试的方向 .....	(262)
第三节 综合性思维是民族性诗学的还乡之路 .....	(268)
结语 未竟的话题：民族神话、传说意象与中国新诗的联姻 .....	(274)
参考文献 .....	(281)

## 绪 论

# “我心永恒”：中国新诗民族性宜向何处探询

### 第一节 研究的历史回顾与目的

众所周知，1993年郑敏先生发表了《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一文，其时的诗坛、学界、文化领域立马掀起了一股轩然大波。文章从语言学的角度剖析了“中国新诗创作已将近一个世纪。最近国际汉界在公众媒体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几千年诗史的汉语文学今天没有出现得到国际文学界公认的大作品，大诗人”<sup>①</sup>的原因，其结论便是新诗的白话文表达与文言文断裂过巨。而与郑先生所抛出的观点看似正好相左，思想原点却完全叠合的便是有关于大诗人穆旦所取的成就其因由之“归认”的问题，王佐良先生宣称：“穆旦的胜利却在他对于古代经典的彻底的无知。”<sup>②</sup> 穆旦自己也“坦言”：“我有时想从旧诗里获得点什么，抱着这目的去读它，但总是失望而罢。它在使用文字上有魅力，可是陷在文言里，白话利用不上，或可能性不大。至于它的那些形象，我认为已太陈旧了。”<sup>③</sup> 上述诸位的话语业已有意无意地确认了新诗的根基出于西方，比较文学界大师梁实秋先生还曾说得更干脆——“新诗，实质是中文写的

① 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

② 王佐良：《一个中国诗人》，引自《穆旦诗集1939—1945》，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页。

③ 郭保卫：《书信今犹在诗人何处寻》，《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杜运燮等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0页。

外国诗”<sup>①</sup>。事实上，普通百姓基于新诗的“晦涩”、“看不懂”等，予其以“西洋味”、“翻译体”之讥可谓是一直未绝于耳。上个世纪 30 年代和 80 年代的知识界也就新诗在接受上的隔膜上演过争鸣、讼案。种种现象都在表明，新诗似乎没有建构或无力建构出自己的“传统”。无论如何，中国新诗要建立在“中国性”之上，这事关中国新诗的生命形态与文化价值。《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一文面世七年之后，郑敏先生与吴思敬教授曾经有过一段对话与辩论，经过整理之后，先后见诸《诗探索》《粤海风》《诗刊》等刊物。郑敏先生认为“新诗还没有什么定型”、新诗还未能“形成一种理论高度”，因为“整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必然有一种历史的贯穿性”<sup>②</sup>，言下之意，新诗与“整个民族的文化”没有一种“历史的贯穿性”。郑敏先生作为“中国新诗”派的一员，同时又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其看法无疑是具有一定道理的。郑、吴这次会谈之后，立马吸引了多位诗评家、诗人卷入其中参与讨论。“新诗有无传统”作为一个值得集中、深入探讨的学术问题浮出了历史地表。李怡教授在《论中国新诗的“传统”》一文中说道：“讨论中国新诗的‘传统’，这在今天人们的心目中当会引发出两种不同的理解：一是中国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的关系；一是中国新诗自身形成的‘传统’。这两种意义上的‘传统’都关乎着我们对新诗本质的把握，影响着我们对未来发展的评估。”<sup>③</sup> 这是从方法论上完成了对过去建构新诗的“传统”只注重新诗与古典诗歌之间在血缘识别上的关系的自我超越，尤为可贵的是文章还意识到和点出了对“新诗有无传统”予以梳理的意义之所在。2004 年《文艺争鸣》第 3 期和《江汉大学学报》第 4 期上分别发表了一组有关“新诗传统”有无的笔谈，实乃郑、吴二教授的话题之续写，孙玉石教授也发表了《新诗的诞生及其传统漫言——为新诗诞生九十周年作》（《诗刊》，2007 年第 5 期）。这场辩论持续了经年，一些主流媒体还对此跟踪报道过。当然，还有一些研究者着手了更为实际的“事务”，如谢志红的《中国新诗的八大传统》（《江海学刊》，2004 年第 3 期）、张志国的《中国新诗传统与朦胧诗起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 年第 5 期）、傅宗洪的《“音乐的”还是“文学

<sup>①</sup> 梁实秋：《新诗的格调及其他》，《中国现代诗论》（上编），杨匡汉、刘福春编，广州：花城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41 页。

<sup>②</sup> 郑敏、吴思敬：《新诗究竟有没有传统》，徐秀整理，《粤海风》2001 年第 1 期。

<sup>③</sup> 李怡：《论中国新诗的“传统”》，《诗探索》2006 年第 1 期。

的”？——歌谣运动与现代诗学传统的再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9期），王强的《中国新诗的知性传统与视听传播》（《广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等等。而除去以纯然时间上的“断代”概念之界定，一批以“中国现代”为名的诗歌研究著述，虽然其着意于理论上的阐发，但都严格以新诗的个案实践与创作史实为依据，如吕进的《中国现代诗学》（重庆出版社，1991年）、吕进主编的《中国现代诗体论》（重庆出版社，2007年）、吕周聚的《中国现代诗歌文体多维透视》（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汪云霞的《知性诗学与中国现代诗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王泽龙的《中国现代诗歌意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袁仕萍的《中国现代诗歌的审美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陈希的《中国现代诗学范畴》（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张桃洲《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新诗话语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王珂的《百年新诗诗体建设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等等，不管其初衷何如，但都在努力地“辨认”中国新诗的“自身传统”了。

其实，将“新诗有无传统”作为命题进行讨论早在80年代初就小荷露角了，袁可嘉先生认为中国新诗“存在自身的传统”<sup>①</sup>，孙克恒的《试论中国新诗的传统及其发展》（《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诗人唐祈的《论中国新诗的发展及其传统》（《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传达着与袁相同的心曲。惜乎，应者稀疏，抑或时值“西风”渐起，人们“羞谈”传统。袁可嘉等人有关于“新诗有无传统”的思考决然不是个人灵感的闪现，而是历史沉积后的必然破土。《女神》甫一落地，闻一多一则“护法”过它的现代性，另则又马上写了《〈女神〉之地方色彩》予以警示，后者在闻氏看来更攸关到新诗的“合法性”，其后，闻又相继出版了《律诗底研究》《〈冬夜〉评论》等著作；20年代，朱湘阐述过“称述华族民性的各相”<sup>②</sup>的叙事诗学；王独清、穆木天等人对胡适“作诗如作文”诗学观的清算，自有几分眷顾传统“诗意”、“诗性”之情；戴望舒的某些诗话也毫不掩饰对传统的称道；40年代，朱光潜的《诗论》、废名的《谈新诗》、朱自清的《新诗杂话》等作品的问世，标志着新诗理论自觉年代的到来，它们更是或暗或明地表露了有志于塑形“新诗传统”的决心；抗战

<sup>①</sup> 袁可嘉：《关于新诗与晦涩、新诗的传统……——访美书简》，《诗刊》1981年第3期。

<sup>②</sup> 朱湘：《“寄罗皑岚”之十六》，《朱湘书信集》，上海：上海书店1983年重印版，第136页。

期间，姚雪垠等人力倡民族叙事诗学，以期加强民族认同感、激涌民族血性；当然，不能遗漏巴人等人所参与的“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的讨论；甚至三四十年代，政治关系波诡云谲，右翼、左派、“中间路线”及后来的“战国策派”等都有“混谈”“民族性”、“民族主义”的曲折历史……因此，随着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政治的强势介入，“传统”一词要不被“策划”成封建文化糟粕的同义语，要不被迫携手或替身“民间”、“大众”而沦为阶级视野，两者都导致认识陷入误区不议，林林总总地、或隐或显地，从理论上来确认和呈现“新诗传统”可谓是贯穿于新诗的整个风雨苍黄心路历程之中。

事实上，学界至今都不遗余力地从史学角度来坐实中国新诗与古典诗歌之间或个案或整体的有机联系，这也就是爬梳“中国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的关系”<sup>①</sup>，探询、揭橥中国新诗传统相应地也是题中应有之义。相关成果极为丰硕、不胜枚举。1994年，李怡在系列论文基础上结集出版的《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视角开阔、思路新颖，系统地“摸索”了新诗与古典诗歌的对应性的内在脉络，颇具标志性意义，影响甚广。新世纪后，邓程的论著《新诗的出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功力扎实，不乏新见。此外，80年代以来该领域上的代表性成果还有张宇宏的《五四新诗与古典诗歌》（《吉林大学学报》，1984年第5期）、张宽的《试论冯至诗作的外来影响和民族传统》（《文学评论》，1984年第4期）、刘烜的《闻一多的新诗、诗论和民族传统》（《文艺研究》，1984年第2期）、公木的《中国新诗歌的发展道路——现代化、民族化、大众化、多样化》（《吉林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等，比较“大胆”地涉足了新诗与“封建文人”作品之间关系的探讨。其后的研究主要集结在90年代中后期了，大致有杨景龙的《新诗名家与中国古典诗学》（《西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主情、主知与主题——试论新诗发展史上的唐诗、宋诗和元曲路径》（《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罗缓文的《百年新诗之“旧路”——中国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关系的几种模式》（《江汉论坛》，2011年第2期）、孙玉石的《他的诗“更新，而且更是中国的了”——林庚诗学探寻与中国古典诗歌艺术之联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曹丙燕的《从山水诗的转换

<sup>①</sup> 李怡：《论中国新诗的“传统”》，《诗探索》2006年第1期。

看新诗对传统继承的立场问题》〔《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罗振亚的《重铸古典风骨——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对传统诗歌接受管窥》（《学术交流》，2009年第10期）、戴惠的《中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与“五四”新诗》（《学海》，2009年第5期）、许霆的《在继承传统诗律中构建新诗格律体系》（《中国韵文学刊》，2009年第1期）、许霆的《在继承传统诗律中提高新诗艺术质量》（《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马大勇的《略论新诗创作对古典诗歌资源的接受与整合》（《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2期）、孔令环的《杜甫对中国现代新诗的影响——以胡适、闻一多、冯至为例》（《中州学刊》，2007年第5期）、段从学的《现代新诗视野与古典文学传统》〔《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钟军红的《中国古代“歌诗”传统之于新诗发展的启示》〔《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於可训的《回归传统：20世纪50年代诗学的格律化趋向——当代新诗形式讨论中的诗学问题》（《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宋秋盛的《朱湘新诗与中国古典诗歌的联系》（《中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4期），黄钢的《新诗的传统诗歌艺术继承》（《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代迅的《新诗会消亡吗？——兼评当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文艺评论》，2001年第3期）、蓝棣之的《新诗对于古典诗歌的传承》（《文学遗产》，2001年第3期）、孙玉石的《新诗与传统关系断想》（《诗探索》，2000年第Z1期）、邓齐平的《论古典诗艺传统在20世纪新诗中的嬗变》（《怀化师专学报》，2000年第4期）、陆耀东的《闻一多新诗与中国古代诗歌的联系》（《诗刊》，1999年第11期）、吴凌的《“旧瓶新酒”与“新瓶陈酿”——从尝试期白话诗与自由体诗看中国早期新诗的传统因素》（《贵州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陆耀东的《闻一多新诗与中国古代诗歌的联系》〔《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姜峰的《“元白”传统与现代新诗的歌谣化趋向》（《江汉论坛》，1999年第10期）、郑敏的《试论汉诗的传统艺术特点——新诗能向古典诗歌学些什么？》（《文艺研究》，1998年第4期），等等。

此外，还有研究者立足于细部研究，并抓住了中国诗歌重视“意象”的这一精神特质，打捞了古典诗歌对新诗的“意象”之影响。其中主要论文有常文昌的《试解闻一多研究中的一个谜——兼谈闻诗的传统意象》（《贵州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朱寿桐的《论中国现代诗歌对古典意

象的继承与改造》(《福建论坛》，2001年第1期)、张新的《新诗中的蝴蝶意象》(《复旦学报》，2001年第6期)等，比较了同一意象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意义内涵。郑平的《中国现代诗歌对中国古代诗歌意象艺术的传承》(《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唐丽芳的《起点的摆荡：胡适对古典诗歌意象的继承与创造》(《晋阳学刊》，第2004年第6期)、黄钢的《新诗的意境》(《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则主要是在提出问题。王泽龙的《中国现代诗歌意象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的重心不在个案分析，但从理论的高度阐述到了新旧意象的内在流脉。

确乎，认知和呈现中国新诗传统离不开“中国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的关系”和“中国新诗自身形成的‘传统’”这两个方面的支撑架构，但进入实际操作层面，两者往往又是“剪不断，理还乱”。一味认同“新诗自身传统”，给人感觉新诗只有新质且它只与西方诗歌交集，这依然将成为被诟病“没有传统”的症结；反之，过于强调“与古典诗歌‘传统’的关系”，虽然意味着新诗本身是在找寻“传统”，但这不仅消泯了自我的“个性”，而且一个无可诘疑的事实便是中国新诗自其面世以来，迄今都与诗经、楚辞、乐府、律绝、词曲诸“样态”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如果说新诗存在“两个传统”，这不仅是语义上的暧昧，而且“传统”一义在这种胶着状态中模糊不清，本身就附赘着何谓“传统”的拷问。在我看来，出现这种困境或焦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拘泥于诗歌形态之间的比对，即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新诗有传统”者，其立足点都在此，这从前文所举隅的研究成果来看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不错，确认和建构“中国新诗的传统”离不开诗歌这一基本资料，否则便是缘木求鱼，但是我们也不能如履薄冰、不敢越雷池半步，最后导致身心蜷缩。庞朴先生在《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中有言：“五四时代有许许多多西洋新说蜂拥而来，其中不少说法和做法曾被广泛宣传，乃至付诸试验；宣传者试验者无疑曾是爱国的、赤诚的，很多还是具有献身精神的。但是真正被中国文化接受的，为人民大众信服的，却为数了了。个中原因，可以举出许多，而文化传统的筛选，或许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外好多学者分析过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安家的根据，也有人探讨过五四所以采取全面反传统手法的原因，结论都认为，其根据和原因，仍在中国的文化传统身上，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方法、行为规范、价值观念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有相通相容之处，是中国有把政和道、真和善捆在一起的传统，因而才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有五四的全面反传统。”

这也就是说，五四引入的新说，都还不过是一些‘用’，它们只因和中国文化传统能相容，被中国文化传统所承认，所接纳，从而附着到中国文化的‘体’上，才得以掀起波澜，发生作用；否则，将只是一些动听好看而无所作用的天方夜谭而已。”“因此，也就是说，五四并未在中国造出新传统，五四以后也未形成新传统；五四以来所发生的，不过是老传统适应新世纪、翻出新花样而已。”<sup>①</sup>不言而喻，庞朴自有其解释学的哲学背景。依循庞朴的说法，中国新诗有且只有一个传统，即“中国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的关系”与“中国新诗自身形成的‘传统’”两者必须统摄起来。不错，是可以统摄的。问题的关键就落在将两者铆接起来的链锁何在。毋庸置疑，此链锁绝不是“诗歌样态”本身了。设为如此，宋词虽有“诗余”之谓，但单就“诗言志”、“词缘情”之说而言，就足见两者是别有霄壤的。进之，诗经、楚辞、乐府、律绝、词曲诸“样态”何其能用“中国古典诗歌”归并在一起呢？好在庞朴先生的“文化传统是不死的民族魂。它产生于民族的历代生活，成长于民族的重复实践，形成民族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简单说来，文化传统就是民族精神”这一说法提供了一种答案。庞朴说得很明白——“文化传统就是民族精神”，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从一种“器”的思维层面即传统诗歌中跳逸出来，而且更应该深入到“道”即民族精神的高度中去追本溯源、正本清流。其实，学界对此已是屡有“小试牛刀”：骆寒超的《论中国新诗中民族忧患类主题思路及诗歌境界》（《文学评论》，1990年第6期）、朱德发的《传统山水意识与孔孚新山水诗》（《东岳论丛》，1990年第4期）、孙玉石的《寻梦的回响：东方民族的现代诗》（《诗探索》，1996年第2期）、张同道的《中国新诗的审美范式与民族心理》（《文学评论》，1999年第3期）、龙泉明等的《古典情怀的现代重构——论戴望舒诗歌向传统回归倾向》（《人文杂志》，2001年第6期）、雷斌的《从审美视点说现代主义诗歌与传统诗歌》〔《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罗昌智的《戴望舒的“雨巷情结”与中国传统文化》（《文艺争鸣》，2008年第5期）、李曦的《庄禅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碰撞与合流——废名诗歌文化内涵简论》（《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7期）等等，基本上是围绕文化意识与审美心理而展开的，敞亮了传统美学、民族性格的魅力，亦生动阐释了传统在文化深层结构中的稳定性。在这点

<sup>①</sup> 庞朴：《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3年第4期。

上，学界在探讨少数民族诗歌上的研究思路与实践成果值得借鉴，譬如邹建军的《论晓雪抒情诗——对民族风格的建构》（《民族文学》，2002年第1期）、张同吾的《民族文化的审美具象——南永前图腾诗谈片》（《诗探索》，2006年第3期）、耿占春的《一个族群的诗歌记忆——论吉狄马加的诗》（《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王菊等的《写意：以民族记忆的方式——巴莫曲布嫫的新诗解读》（《中华文化论坛》，2008年第3期）等，它们都是基于审美心理、生存体验、内在意识等真正进入了民族精神层面的探讨。或许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谈及少数民族诗歌与传统关系时，是很难将其拉入唐诗、宋词、元曲等系统之中的。

饶有意思的是，从学理上对文学、文艺与民族精神之间关系的探讨及对文艺、文学的民族性之呼唤由来已久、“熙熙攘攘”，但从民族精神的角度落实到新诗史上的研究却“门可罗雀”。因此，基于中国新诗传统的研究现状，本书拟将努力地跳过新诗、旧诗在“样态”或在传统文化层面上的比照、勾连，而从民族精神即文化传统的这个角度来探讨“新诗有无传统”，以期获得某些认知。

## 第二节 研究的理论基础与意义

据有关资料表明，黑格尔阐述的“民族精神”这一概念最为详细、最具权威，他认为：“（世界精神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和任何其他阶段不同，所以都有它的一定的特殊的原则。在历史当中，这种原则便是‘精神’的特性——一种特别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便是在这种特性的限度内，具体地表现出来，表示它的意识和意志的每一方面——它整个的现实。民族的宗教、民族的政体、民族的伦理、民族的立法、民族的风俗，甚至民族的科学、艺术和机械的技术，都具有民族精神的标记。”<sup>①</sup>此前的孟德斯鸠和德国哲学家赫尔德对此均有所涉足。特别是后者的观点——“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独特的精神——它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创造一切，理解一切”<sup>②</sup>——极具启示价值。首先，此言凸显了“独特性”在“民族精神”要义中的地位，黑格尔对此有所汲取；其次，它视“民族精神”为“创造

<sup>①</sup> [德]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04页。

<sup>②</sup> [伊朗] 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杨桢钦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99页。

一切，理解一切”的前提，这就牵涉到了文化接受、文化融合上的大问题，即民族精神虽然是与个性、固有性密不可分，但正如庞朴先生所说的，“在文化传统中，有无超越历史超越民族的成分，非时代性非民族性的成分，或人类性的成分呢？应该承认，这种成分是有的。因为作为动物的人类，彼此是相同的；作为人性的人类，存在和发展的样式也大体相似。因而，不同的人群在各自圈子里形成的传统，必然要有相同和相似的成分”<sup>①</sup>，也就是不同文化传统之间可以融合、互相促进，问题就在于这种融合与促进其立足点还是“民族精神”，他异文化能被吸纳，终究不过是被“民族精神”所“创造”和“理解”过的。综合这两方面来看，无论时空相隔多巨，文化传统总是一脉相承，较为恒定的。因此，这也最终必定落实到民族精神的源头何在上来，因为“民族的宗教、民族的政体、民族的伦理、民族的立法、民族的风俗，甚至民族的科学、艺术和机械的技术”这些文化传统中的具体表象（即传统文化）可能显现它们的时代特征，但是文化传统总会和自己的源头遥相呼应、血脉相连。这源头正是民族神话、传说。

神话、传说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源头和精神根底，随着“民族精神”一语的提出，人们对此的认知也逐渐清晰起来。易言之，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民族神话、传说对文化民族性的终端性驻留，或者说，民族性是神话、传说的突出特征。这与历代思想家的不懈探索分不开。首先，正如上文所提到过的赫尔德就认为：“不应该把荷马的史诗看作人类的共同法典和范例，而应该‘看作回响于古希腊听众的耳际和心中独具特色的民族诗歌’。”<sup>②</sup>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有奉神话为拯救该民族天然创造力之精血的诗学观，神话与民族之间的对应关系在其思想体系中表述得明白无误。荣格在《论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中写道：“原始意象或原型是一种形象，或为妖魔，或为人，或为某种活动，它们在历史过程之中不断重现，凡是有创造性幻想得以自由表现的地方，就有它们的踪影，因而基本上就是一种神话的形象。更为深入地考察可以得出，这些原始意象给我们的祖先的无数典型经验赋以形式。”<sup>③</sup>以此而言，荣氏所谓“我们的祖先”就是“族群的祖先”的泛称，“神话的形象”就是以民族性为背景的。冯特则在《民族心

① 庞朴：《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3年第4期。

② 吴元迈：《文艺的民族性与文艺的世界性——关于文艺的民族性几个问题》，《文艺研究》1996年第1期。

③ [瑞士] C·G·荣格：《论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神话——原型批评》，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0页。

理学》中认为，神话是洞察种族群体心理的窗口。在历史学界，神话、传说往往成为人们探颐索隐远古时期某个民族生存足迹的客观依据，故而神话有“民族志”之谓。固然，随着比较神话学的蓬勃发展和功能文化学派的一度崛起，神话、传说似已突破了民族阈值而表现出世界性的通约，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忧郁的热带》、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原始神话》《原始心灵》、弗雷泽的《金枝》等皆有这种认识上的“暧昧”。但这并不否定差异性的存在，譬如列维－布留尔提出了“集体表象”这一概念，“集体表象”作为一种心理活动或精神性的实践，其基石正是它的集团性、宗派性，而不是“人类性”。所以，有学者在探讨“神话与民族精神”时指出：“体系神话是古代意义的‘世界神话’”，“虽然是社会发展、文明出现的必然产物，但不同的民族生活、文化心理和‘民族精神’，却足以给各民族的体系神话打上不同的印记、铸造不同的形态”。<sup>①</sup>“神话与民族精神互为表里。神话是民族精神的最初记录。”“任何民族的神话，总与这个民族内在的精神气质相贯通，所以神话不会灭绝。”“复苏的神话，当然不会是原始形态的神话。但它却显示民族精神已开始摆脱文明的固定轨道及其繁文缛节的束缚，重新站立到一个更少偏见的立点，不受拘限地寻求自己的出路。当此之际，神话被赋予了‘唤醒’民族的灵魂、‘滋润’民族精神的现实功能。神话与民族精神一同深植于民族的集体意识中，而后申发开去，化为形形色色的表象。”<sup>②</sup>既然神话、传说与民族精神相契得如此紧密，在整个文化体系中又占据了如此重要的席位，因此，“无视神话在民族精神生活的转变中所具有的巨大潜能，是浅见。企图压抑这一潜能，不使它重新上升到民族精神的表象世界中来，则会压抑民族的活力。神话的复兴，有激励民族的特性、促成与保存民族特性的价值”<sup>③</sup>。当然，于此有必要“顺便”指出的是，民族精神这一概念本身没有一种价值上的判定，如果将其做狭义化处理，要么只看到它的先进部分，譬如针对某些特殊时期，它助推了整个民族渡过难关；要么只看到它的劣根性，也是某些非常时段，如“五四”文化运动将其片面地理解为

<sup>①</sup> 谢选骏：《民族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0页。

<sup>②</sup> 谢选骏：《民族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393页。

<sup>③</sup> 谢选骏：《民族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393页。

“国民性”。这些都是不利于对民族精神本身的认识，自然也是偏离了孟德斯鸠、赫尔德、黑格尔等人对其厘定的原初要旨。本书看重的是神话、传说对“民族特性”有着驻留和促进之作用，而且从整体意义上讲就是要突出民族神话、传说在保持整个中国新诗民族性中的正面价值，但对神话、传说本身在价值评判台上的是是非非，进而是否一定释放了“民族的活力”等则保持着中立态度。而且，正是从这点出发，本书为了以防某种价值上的“误解”和针对本书的议题而言，在后文的表达中将“民族精神”具体地处理为“民族性”，这正如鲁迅在评论陶元庆的画时说：“他以新的形，尤其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魂灵——要字面免得流于玄虚，则就是：民族性。”<sup>①</sup>事实上，至少在本书的界面上，两者所指涉的内涵是相通的、同一的。

将诗歌与神话、传说摆置在一起，两者之间的姻亲关系也是不言而喻的。在精神文明这方热土上，诗歌与神话、传说不仅根脉同系，乃至萌蘖由之，而且两者在把握世界的方式上有着相当近的亲缘关系，诸如意象思维、重视象征、声传口诵等都在其列。近现代以降，集结了一大批的思想成果。维科的《新科学》当仁不让是本领域上的“开天辟地”之作，“诗性智慧”等命题一经提出便占据了历史制高点。黑格尔的《美学》（第2卷）、卡西尔的《语言与神话》、梅列金斯基的《神话的诗学》、韦勒克与沃伦的《文学理论》以及弗莱的《批评的剖析》等相关内容虽然不都是局限在狭义的诗与神话之间，但对两者之间关系的廓清是“功勋卓著”的。卡西尔在《人论》中引述过的他人的話，即“古代神话，乃是现代诗歌靠着进化论者所谓的分化和特化过程而从中逐渐生长起来的‘总体’（mass）。神话创作者的心灵是原型；而诗人的心灵……在本质上仍然是神话时代的心靈”<sup>②</sup>，已成为人们认知神话与诗歌关系的“经典语录”。“神会”于西方，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也曾指出，诗、歌、舞、戏之兴，“始于古之巫”。“巫”就应包括神话、传说的仪式化。鲁迅在《神话与传说》中也说，神话“实为文章之渊源”<sup>③</sup>。在“五四”时代，除了鲁迅之外，周作人曾经也醉心于希腊神话及其相关的神话理论，并将神话与童话常常比附在一起，从

<sup>①</sup> 鲁迅：《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73页。

<sup>②</sup> [德]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页。

<sup>③</sup>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中发现了希腊“爱美的精神”<sup>①</sup>，他对哈利孙女士所说的“希腊民族不是受祭司支配而是受诗人支配”<sup>②</sup>，“这是希腊的美术家与诗人的职务，来洗除宗教中的恐怖分子，这是我们对于希腊的神话作者的最大的负债”<sup>③</sup>这一观点深有同感。易言之，在周作人看来，神话就是“诗歌”，就是涵泳一种特殊的“美”能作用于世道人心。当然，有关于在“五四”前后，一批先觉者和启蒙者对神话的重视，对神话、传说与文艺、与诗歌之间关系的辨认，在本书后面会重点谈及，于此就不拟展开。在当代，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中指出：“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说文化的土壤里。”<sup>④</sup>凌宇教授在《重建楚文学的神话系统》<sup>⑤</sup>一文中亦充分地表达了要重视民族神话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价值与作用。

人们在民族性、神话、诗歌这几者之间关系上的理性认识，无疑为本书提供了从民族神话、传说角度来辨识新诗民族性的理论基础。不过，问题的中心环节虽然系扣在民族神话、传说对中国新诗的影响研究之上，但必须要明确的是：本书不可能“混沌未开”地将整个20世纪中国新诗史与民族神话、传说树为两大板块，形成对垒之势，严格对照起来，并将“原型分析”奉如神明，在此基础上通盘予以爬梳剔抉、甄别勘判。设若如此，这不仅落入了以史证论的方法论之筌，而且在这种本末倒置之中只会治丝益棼，结论也空而不当、似是而非。因此，本书固然有类于“跨学科的影响研究”，但实处将落在民族神话、传说被用典、重叙、新造的这一基本事实之上，依然是“内部研究”。总之，本书主旨就是以考量出相应诗歌正是由于民族神话、传说的意象及相关意象的存在，尽管置身于现代化进程中却能使自身保持和显露出民族个性的历史为己任的。或者说，本书的核心点就在于以民族神话、传说意象为视点来观照相关诗歌所呈现出的民族性意向。当然，这也只是众多认知中国“新诗传统”方式中的一种。在本书看来，用民族神话、传说意象来观照中国新诗的民族性有着以下几个方面的价值与意义：

首先，用民族神话、传说意象来观照中国新诗的民族性，是对中国新诗传统做出辩证的一种尝试，也是管窥民族精神的一种途径。确乎，近些

<sup>①</sup> 周作人：《希腊闲话》，《新生》第1卷第2期。

<sup>②</sup> 哈利孙：《〈希腊神话〉引言》，岂明译，《语丝》1926年第94期。

<sup>③</sup> 哈利孙：《论鬼脸》，见《希腊神话》第3章第1节，岂明译，《语丝》1925年第42期。

<sup>④</sup> 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

<sup>⑤</sup> 凌宇：《重建楚文学的神话系统》，《上海文学》1986年第6期。